

钟嵘《诗品》一种新的版本

邬 国 平

钟嵘《诗品》的版本是研究者一直都关心的问题,经前辈学者不断搜寻、研究积累,至曹旭先生《诗品集注》、《诗品研究》(1994年、1998年分别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下称曹著《集注》、《研究》),已发现《诗品》版本五十种。应该说,这已经基本摸清了元代以后《诗品》的历史家底。这既代表了《诗品》研究的一份实绩,更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诗品》夯实了基础。曹旭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诗品》版本的研究无事可做了。我们要对已经找到的《诗品》版本作进一步认真考辨,以求得更加正确的认识;其次,《诗品》可能存在而尚未被发现的版本仍值得我们继续留心,以便在掌握更多资料的基础上,对某些问题求得更加精确和可靠的结论。

先说第一点。曹著《研究》叙录了五十种《诗品》版本,并分别对它们做了源流辨析。由于其中不少本子第一次被发掘出来,纳入研究的范围,偶有疏失也在所难免。如《硃评词府灵蛇》本《诗品》,曹旭先生称其为“明钟惺辑”,并云“此为钟惺天启乙丑(1625)秋刊本”;在介绍《诗品》的明代研究和流传情况时,曹旭先生径称此为“明钟惺辑《词府灵蛇》本”。得出这样的结论,其根据是《词府灵蛇》卷首的一篇序文,该文末署“天启乙丑秋日景陵伯敬甫钟惺题”。钟

惺字伯敬，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竟陵县建置于秦朝，五代后晋天福初，为避讳而改名景陵，宋元明及清初沿用，故钟惺又被写作“景陵”人。钟惺卒于天启五年乙丑（1625）六月二十一日，这在他友人的诗文中具有具体而明确的记载。谭元春《丧友诗三十首·引》云：“予与钟子交，……起万历乙巳，讫天启乙丑。^①”此“讫天启乙丑”是指因钟惺于该年去世而二人结束了交往。徐波《遥祭竟陵钟伯敬先生文》云：“天启五年六月廿一日，竟陵钟伯敬先生魂归于冥漠。^②”“六月廿一日”及之前自然是不能称之为“秋日”。很显然，以上这篇署“天启乙丑秋日”“题”的序不可能是钟惺所撰写，而是他人的伪作。从作伪者连钟惺去世都不晓得来看，他与钟惺之间不会存在什么私人关系，退一步说，即使有些关系的话，那一定也是非常疏远的。这说明，甚至连钟惺向他授意编书或作序的可能性也都不会存在。作为竟陵派最主要的首领，钟惺以评点《诗归》（与谭元春合）名重于当时的文坛和刻书界，而他的名字也就成了书商藉以牟利的工具。现存署钟惺评点、编刻的书多达数十种，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冒名之作，可以肯定，《词府灵蛇》也是其中的一部。因此，《硃评词府灵蛇》本《诗品》的编辑者不可能是钟惺，不应当将该书归在他的名下。

下面着重谈第二个问题。

笔者最近在翻检明人唐顺之编《稗编》时，发现其中刊有钟嵘《诗品》，它不包括在曹著《集注》、《研究》所列出的五十种版本里面，显然是以前未被发现的《诗品》一种新的版本，以下简称《稗编本》。

《稗编》（又名《荆川稗编》）一百二十卷，是唐顺之编的一部类书。有明万历九年（1581）文霞阁刻本、《四库全书》本。万历九年刻本卷首有茅坤《荆川先生稗编序》、唐顺之《稗编自序》、茅一相《文霞阁刻稗编引》。茅一相在《文霞阁刻稗编引》的“例义”部分云：“（唐顺之）尤勤于撰述，其所最著者有四：曰《左编》，曰《右编》，曰

《文编》，曰《稗编》。”《稗编》“初名《杂编》，后改为《稗编》。”“凡四易稿，十年而后成。”并引唐顺之门人姚翔的话说：“吾师最属意于此。”“例义”还说：

是编刻初成于先生之门人左丞，功方一篲也。及左没而复废，颇多残缺之失。庚辰岁（万历八年，1580），余始得而读之，朝不栉沐、夜不寝褥者数匝月，乃竟杀青。

茅坤《荆川先生稗编序》亦说：

予侄一相复得左所梓公《稗编》者，仅什之三。已而复得公所尝三脱手稿者，而稍稍群诸兄弟及他友人合校，凡什之七，而终始之。

这说明，在文霞阁刻行《稗编》以前，唐顺之门人左丞（一作“烝”）已经将它部分刊刻出来，所以，文霞阁刻本在各卷之首的第一行，镌有“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编”的字样，“新刊”正是相对于左丞刻本而言。左丞所刊刻的这部分《稗编》今未见，其中是否包括钟嵘《诗品》在内不得而知。然文霞阁刻《稗编》载有《诗品》的一卷，其卷首题“门生毘陵左烝考校”，据此，《诗品》似乎有可能为左氏原刊所有。《天禄琳琅书目》卷九介绍《荆川稗编》一书亦云：“其书为顺之门人毘陵左烝所刊，后茅坤侄一相以其不载原书，批点为之鐫入，其实仍为左氏原版，观书中每卷标题之下，仍各载考校门人姓氏，而左烝之名列于卷首，是可证也。”不过，假如茅坤“（左刻）仅什之三”的说法确实可信，则左刻《稗编》的分量其实还是比较有限，而文霞阁刻本《诗品》在《稗编》卷七十三，所以左丞刻本不包括《诗品》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题“左烝考校”只是表明他对卷中的内容作过考校，并不等于这部分内容已经刻成。所以在没有发现左丞刊《稗编》确有《诗品》以前，不妨先把《稗编》本《诗品》最早的刊刻时间定为万历九年。

《稗编》本《诗品》载该书卷七十三《文艺二·诗赋》，目录三行：

诗评序 钟嵘后同

诗品上

诗品中

卷中《诗品》正文：《诗评序》总名下，分别为上品序曰（自“气之动人”至“均之于谈笑耳”），中品序曰（自“一品之中”至“请寄知者尔”），下品序曰（自“昔曹、刘殆文章之圣”至“文彩之邓林”）。各品之序均换行。然后是上品（全部）、中品（部分），无下品。与《诗品》同在一卷的，前面分别为：刘勰《文心雕龙五论》（按：指《诠赋》、《辨骚》、《情采》、《声律》、《乐府》）、吴讷《文章辨体二十四论》、沈约《宋书·谢灵运》。后面分别为：白居易《与元九书》、韩愈《送孟东野序》、杜牧之《评李贺》（上列篇名在《稗编》中如此，有些与原来篇名有所不同，系由编者所改）。

《稗编》本《诗品》当来源于宋章如愚《山堂群书考索》本《诗品》（现所存有元延祐七年刻本、明正德戊辰重刻本，参见曹著《研究》），其理由如下：

（一）《稗编》曾参考过《山堂群书考索》，它的一部分内容是从《山堂群书考索》引录过来的。茅一相在《文霞阁刻稗编引》的“例义”部分谈到他处理编入文章作者的题名原则，说：“诸家有文集可考者，并以名见。间有杂出未详者，姑阙以俟之。他如《通考》、《考索》、《通典》、《义海》之类，则以其文非编集之人所作，姑但以书名，不欲竟以其人袭之。”其中《考索》即指《山堂群书考索》。如卷二《河图洛书之书》、《伏羲画卦次序横图》、《伏羲画卦次序圆图》、《先天后天图》等文，皆署“章俊卿（章如愚字俊卿）《考索》”，表明这些文章引自《山堂群书考索》。又如同卷《先天方圆之图论》，署“朱熹。章俊卿《考索》。”说明该文作者为朱熹，《稗编》编者却是引自《山堂群书考索》。茅坤《荆川先生稗编序》云：《山堂群书考索》一书“较之唐宋以来杜氏《通典》、马氏《文献通考》及章氏《山堂考索》诸书，什且百之矣，览者当自得之。”由于茅坤在对《稗编》与《山堂群书考索》等书作比较说明时，没有指出《稗编》对《山堂群书考索》等书资料

借助的一面，容易使人模糊乃至误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故有必要加以指出。

(二)《稗编》所载《诗品》虽然没有直接标注取自《山堂群书考索》，但是，上品刘桢“壮气爱奇”，“壮”字《竹庄诗话》、《诗人玉屑》所引皆作“仗”，《山堂群书考索》本《诗品》则作“壮”，《稗编》本《诗品》与《山堂群书考索》本同。鲍照“照”字，《山堂群书考索》本《诗品》作“昭”，《稗编》本亦作“昭”。又《山堂群书考索》本《诗品序》“吞晋宋于胷中”，“胸”刻作“胷”，《稗编》本《诗品》上品序亦作“胷”。这些都可以证明《稗编》本《诗品》确是来源于《山堂群书考索》。至于《稗编》未注明取自《山堂群书考索》本《诗品》，可能是因为《稗编》本不是全取《山堂群书考索》本《诗品》，而是对它作了节选，而且改变了《山堂群书考索》本《诗品》序的形式，以示与以上直接引录的例子有区别。当然，《稗编》本也参考过《诗品》其他的本子，如《稗编》本称作《诗评序》，《山堂群书考索》本则作“诗品序”，《稗编》本所依据的当是别的《诗品》本子。

与现在所能见到的早于万历九年的《诗品》相比较，《稗编》本《诗品》有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一、品第文字完整的只有上品诗人，中品依次只选录郭璞、陶潜、颜延之、鲍照、谢朓五人，不录下品诗人。因此，《稗编》本《诗品》是一个经过编者删削的不全本。全部录入上品诗人，因为这部分品第内容最能够反映钟嵘的诗歌标准，在《诗品》一书中其重要性几乎与序相当。不录下品诗人，当是唐顺之认为他们整体的地位不够高，钟嵘对他们的品第文字在《诗品》中其重要性也并不突出，没有必要采入到《稗编》。这些都比较容易理解。中品录五人，不录其他诗人，其原因比较复杂些。未录的诗人中，一部分当是唐顺之认为他们还不够重要，删去这部分内容的道理与全部不录下品诗人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像不录中品诗人张华、刘琨、沈约等，唐顺之更可能是体现出了他自己对诗歌所持的观点。他论诗重本色，主张直据

胸臆。他讲自己作诗，“率意信口，不调不格”^③。认为“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自有诗以来，其较声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说最严者，无如沈约，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读其诗，祇见其綯缚齷齪，满卷累牍，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何则？其本色卑也。”^④这就是他在《稗编》本《诗品》中存陶潜而不存沈约的原因。他反对过亢过柔两种倾向的诗风，主张取其“中声”，云：“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惟其慷慨而不入于猛，柔婉而不邻于悲，斯其为中声焉而已。”^⑤显然，依照唐顺之的诗歌标准，张华过柔，刘琨过刚，皆不合“中声”之美。相对而言，郭璞、鲍照、谢朓的诗歌较少偏柔偏刚之失。颜延之诗虽然辞彩华丽，“错彩镂金”，但是“情喻渊深”，“一字一句，皆致意焉”（钟嵘语），具有以意相胜的特点，从而避免趋入过于柔婉的一端。这样，我们从《稗编》本《诗品》对中品内容的取舍，可以看到明代中期诗歌批评的某种风气，特别是唐宋派和唐顺之本人对诗歌的一些具体看法，借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诗品》的流传与时代、流派与批评家个人因素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它本身也是研究《诗品》接受史很好的材料。

二、对《诗品》序文的位置重新作了调整。在《稗编》本以前，现能见到的《诗品》序皆分为三段，各段分别置于上品、中品和下品之前，一品以一序相冠，故有径用《上品序》、《中品序》、《下品序》相称者。《山堂群书考索》本《诗品》略有不同，上品之前的序称《诗品序》（曹著《研究》认为这是《诗品》“全书总序”），中、下品之前的序各用“诗品中序曰”、“诗品下序曰”为开头，该本子的序三段文字分别被安置在上中下三品前面，这一点与其他本子又没有什么两样。《稗编》本《诗品》的序品结合形式却完全不同。它完整保留了诗品序的内容，却全部被置于《诗品》的最前面，总名《诗评序》，序正文三段，每一段开头分别是“上品序曰”、“中品序曰”、“下品序曰”，各段起讫文字与它本《诗品》相同。这样，《稗编》本完全改变了在它以前所

通行的《诗品》序品相间的面貌，将它改变成为先序(三段)后品(按：书中不收下品)全新的形式。

唐顺之所以对《诗品》序的形式作上述改变，其最直接的原因固然是《稗编》本《诗品》不采录下品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按照原来一品一序的形式，下品序必然会无所附着，所以为了在下品的具体品语已被删削的情况下能够完整保留《诗品》序的三部分文字，编者便将原先三段互相分开的序连在一起，置于《诗品》最前面的位置。不过，对改变《诗品》序形式的原因仅仅作如是解释，似嫌过于简单了一些。我们可以提一个问题：“既然下品品第的具体内容可以删削不录，为什么一定还要保留下品序的文字呢？如果将下品序也同时删去，不是可以继续保持《诗品》原有的品序相间形式不变吗？”这样提出问题，似乎有些强词夺理，不过仔细想一想，也未尝没有道理。编者作这样的舍取决定，至少反映出他对《诗品》的一种理解，即《诗品》序比具体的品第内容(除上品外)更加重要，品第内容(指中品和下品)可以节删甚至全删，《诗品》序则必须全部保留，保持其原有的完整性。这种《诗品》序的重要性在具体品第语之上的看法可能早已经在宋明人心目中产生。自《诗品》问世后，它一方面广受人们重视，另一方面随着诗歌风尚和阅读习惯的改变，它也遭到一些非议。宋明人对《诗品》序的批评涉及与钟嵘有关五言诗起源的不同看法(如宋人王得臣《麈史》卷中《诗话》)，对《诗品》品第内容的批评则包括对某人诗源出于某人、陶渊明品第位置等提出质疑，其中尤其是对置陶渊明于中品表示强烈不满，叶梦得《石林诗话》、黄彻《碧溪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闵文振《兰庄诗话》等都极力申述陶渊明宜居上品不宜居中品的理由，而斥钟嵘对陶渊明的品第安排是“陋”见，是令人迷惑的。可见，宋明人对《诗品》的批评虽然兼及序和品第两个部分，但是对品第内容的批评相对显得更加突出和尖锐。说明，他们对《诗品》序的认同比对具体品第内容更加广泛，这无疑使人们加深了《诗品》序较之于

品第内容更加妥确、更加重要的印象。《稗编》本《诗品》删削品第内容却完整保留序文，正是人们对《诗品》形成的这一认识的一种反映。

据现在所见到的较早的《诗品》本子，推测钟嵘撰成《诗品》时其序应分为三篇，分别置于该书不同的部位，这种意见有很充分的理由。而从这三篇序表述的内容来看，虽然每篇各有侧重，又都关涉诗歌创作和批评的原则、贯通全书的体例等等带有总论性质的问题，所以这三篇序给人总体的印象，与一篇序所构成的三大段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正因为《诗品》的三篇序文具有上述特点，在《诗品》序比具体品第内容受到更加广泛认同的情况下，明人就产生了将三序合编在一起以突出其重要性的尝试。在《稗编》之前，冯惟讷《古诗纪》卷一百四十五《别集第一·统论上》已经将《诗品》的第一和第二篇序（或称《上品序》、《中品序》）连载在一起，卷一百四十六《别集第二·统论下·声律》则又收录《诗品》的第三篇序（或称《下品序》）^⑥。编者显然认为，不仅《上品序》（该序前人引作《诗品序》）总述诗歌原理，而且《中品序》和《下品序》也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性质，故把它们收在“统论”部分。《古诗纪》把《上品序》和《中品序》载在一起，更是朝三序合一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到唐顺之编《稗编》，将《诗品》三序在《诗评序》总题目下归为一个部分，将《诗品》的品第内容归为另一个部分，序在前，品在后，从而走出了改变《诗品》全书结构的关键的第二步。从此，《诗品》有了先序后品新的版本形式，这在《诗品》版本演变史上当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曹著《研究》认为，三序合一始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何文焕《历代诗话》本《诗品》，说：“何氏此本，将原三序合为一序，置于卷首，改《诗品》三序三品为前序后品，与元、明、清以来诸本面貌完全不同。知其臆改而无根据。”现在《稗编》本《诗品》的发现，当然会对这个问题得出不同的结论。将《历代诗话》本与《稗编》本作比较，二者处理三序合一的具体方法也有一定的差别：《稗编》本《诗

评序》的三段内容，各段分别冠以“上品序曰”、“中品序曰”、“下品序曰”，在新变中依稀犹见旧貌；《历代诗话》本《诗品序》虽依然分成三段，但是已经完全没有有了上中下品序之标识，给人更像是一篇序的感觉。因此，与其说何文焕使《诗品》另成一个新的版本系统，毋宁说是他在冯惟讷、唐顺之（尤其是唐顺之）的基础上，继续走出了改变《诗品》序形式的第三步。

版本研究的目的，不止是确定一部书籍最早母本的版本样式，还要通过对不同本子的比较，去了解该书在流传、被接受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异变情况，并进而寻究其中原因，使版本研究成为更加丰富的文化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对有些与其母本面目不同、自成系统的新本子，是不能用一个“错”字予以简单定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稗编》本《诗品》以及与之相近的《历代诗话》本《诗品》，自有其不容忽视的研究价值。

注：

①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卷十五，第4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②钟惺：《钟伯敬先生遗稿》附，明天启刻本。

③《荆川先生文集》卷四《答皇甫柏泉郎中书》，明万历刻本。

④同上卷七《答茅鹿门知县二》。

⑤同上卷六《东川子诗序》。

⑥张四维《古诗纪序》云：冯惟讷编《古诗纪》，“始事于甲辰（嘉靖二十三年，1544）之冬，集成于丁巳（嘉靖三十六年，1557）之夏，岁凡十四稔。”（《古诗纪》卷首）该书最早有嘉靖三十七年（1558）吴琯校刻本。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